本卷导言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至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教育制度，即通常所说晚清教育制度，虽然时间不长，仅有数十年，在中国教育制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却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中国教育制度走出中世纪，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的转型期。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出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剧烈变革，教育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形式完备的封建教育制度虽然存在，但已徒有虚名。官学名存实亡，书院积弊丛生，私塾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传统教育制度已完全不适应中国社会向近代变迁的客观需要，与世界教育潮流也格格不入。它已经腐朽没落，走到了尽头，必须实行变革。这种变革，是伴随着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和对西方教育的学习，作为一个过程，以多种表现形式逐渐展开，逐步深入的。

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在无情地批判传统教育的空疏无用,要求改革八股取士制度,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同时,积极主张“悉夷”“师夷”,喊出了我国近代学习西学的先声，迈出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第一步，开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变革的先河。

太平天国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运动。与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不同，它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十分重视文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教育建设。它以拜上帝教作为文教建设的指导思想，猛烈抨击孔孟儒学，建立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实行男女平等教育。它编写各种书籍作教材,废除四书、五经教育内容,积极改革科举制度,重用知识分子，不拘一格举人才，等等。太平天国个别领袖人物如洪仁玕等，虽也曾受到西学影响，提出过若干具有近代色彩的教育主张，但就总体而言，太平天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种种举措，反映了农民阶级对于变革封建教育的愿望和要求，虽不代表时代发展的方向，但仍不失其积极意义。

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洋务派把地主阶级改革派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从思想变成了行动。他们创办了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批新式学堂，派遣了最早的官费留学生，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新型人才，虽然数量有限，质量差强人意，但其意义不可低估。毕竟在封建教育封闭的圈子上凿开了缺口，迈出了学习西方教育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开始了中国传统教育的革命性变革，宣告了近代中国新教育的产生。

甲午战争惨败,民族危机加剧。在痛定思痛之后,人们更坚定了向西方学习的选择，加速了学习的步伐。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鼓吹宣传在前，“百日维新”中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在后,19 世纪末的神州大地掀起了一个更为广泛深入的学习西方教育的高潮，从而将近代中国新教育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虽然随之发生的戊戌政变，曾使新教育的发展一度横遭厄运，但它终究不可抗拒，不久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20 世纪初，清政府为了缓和矛盾，维护统治，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在教育上进行一系列改革。将全国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大力发展新式教育。提倡向‘强敌’学习,积极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形成留日高潮。1902 年和 1904 年,分别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建立近代学制。随后,又于 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央设立学部，在地方设立教育行政机构，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

整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所有这些，标志着近代中国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国教育初步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在晚清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教会教育值得注意。它是由外国传教士或教会在中国设立的一种特殊学校教育，有自成体系的运作方式、课程设置、教科书的编制和选用、学业评价以及管理体制。教会教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的教育特权,其目的在于培养教徒,扩大势力,使中国‘基督教化”,具有侵略性和奴化性。另一方面，相对于封建教育而言，它又是一种先进的异质教育。它对于中国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新型人才的培养，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科技知识的传播，对于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理论的发展，一句话，对于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在客观上起了积极作用。所以，教会教育又具先进性和进步性。

以上所述，是晚清教育制度发展的基本线索。下面将对所涉内容分章进行具体阐述。

本卷撰著者，按章节顺序为：金林祥教授（导言，第三章第二节“二”,第三节和结语),周瑾博士(第一章),庞守兴博士(第二、六章),张蓉博士(第三章第一节),许国春硕士(第三章第二节‘一”),叶存洪副教授(第四章),赵俊杰副教授(第五章)。

在撰著过程中，我们参考和吸收了学术界尤其是中国教育史学界前辈和时贤的研究成果，在此谨表谢忱。限于水平和时间，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祈读者批评、赐教。

第八编　清代教育制度（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晚清封建教育制度

19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穷途末路的时期，此时的中国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种种的社会矛盾以及人口、财政、武备、吏治等难题摆在人们面前，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日益加重的地租盘剥带来频频不断的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外强交逼，祸在眉睫，中国面临着千古未有之变局。但清朝的统治者们仍然浑浑噩噩，夜郎自大，沉醉在天朝大国的歌舞升平之中。清政府奉行的专制主义与排外主义两大文教政策，使教育的发展笼罩在一片争名逐利、脱离现实的沉闷肃杀的气氛之中，衰败不堪的教育已不能发挥维护封建社会生存与发展的作用。鸦片战争中，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清朝闭关自守的大门。封建教育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强烈的冲击。以龚自珍（1792—1841 年）、林则徐（1785—1850 年）、魏源（1794—1857 年）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在猛烈批判封建教育的基础上，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主张学习西学，开近代史上学习西方的先河。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思想由此发端。

第一节　晚清教育制度的衰败

从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到鸦片战争爆发，这 200 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受制于清朝统治集团的两大文教政策，一是专制主义，一是排外主义。这两大文教政策使文化教育得不到外来因素的刺激，直至鸦片

战争仍保持着传统封建教育的特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晚清教育正是这种衰败、腐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反映,已经到了衰败不堪的境地。

一、官学名存实亡

晚清的封建教育制度在形式上是十分完备的。在中央设有国子监，它既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又是中央官学的最高学府。此外,还有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算学和俄罗斯文馆。地方上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社学、义学和井学。而实际上，这些官学徒有虚名。“讫于嘉庆，月课渐不举行。……嗣是教官多阘茸不称职,有师生之名,无训诲之实矣。”① 尤其是嘉庆、道光之后，“官学积渐废弛，八旗子弟仅恃此进身。教习停年期满予录用例,月课虚应故事”②。可见，随着晚清整个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官学也逐渐名存实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官学教育以科举为依托

自从科举制度产生以后，封建官学就成了科举的附庸，到了晚清，官学则完全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属品。官学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都围绕着科举考试进行。科举考什么，学校学什么；科举怎么考，学校也就怎样考。官学教育完全以科举为依托。这突出地表现在,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科举以求功名,即“储才以应科目”。清朝历代统治者虽然都强调育才的重要性，但在学校与科举的关系上，他们更重科举，科举是学校教育的核心。顺治十年(1653 年)上谕中说:“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③ 肯定了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应举入仕。晚清,这种状况愈益突出,致使“天下之习,不惟其教,而惟其

① ②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 106 卷,中华书局,1976 年版,第 3116 页,第 3111 页。

③ 《清文献通考》卷六九,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上海图书集成局铅印本。

所取，所取而为科举之文欤？则其学为科举之学’①，科举成为士子的进身之阶，求取功名的敲门砖。因此“考其学业，科举之法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②。显然，清朝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科举以求功名，致使教育的重心不在学校而在科举，学校只为科举做准备，自然不能得到正常发展。正如有的论者所云：“国家设立学校，而以科举道之，故教化不行 教化不行，故人不事学业。以不事学业之人，又无恒产以资其生，则其心之放辟邪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于是乎学校多游民矣，故曰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也。’③

同时，教学内容空疏无用。“八股’考试自明代出现，到了晚清，八股考试已经发展成为一套十分呆板、机械的考试格式，在命题上出现了一些十分偏怪的‘截答题’‘枯窘题’，考试题目‘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④，使得学者无所依据。考试内容空疏无用，因此，教学内容也是空疏无用的八股文。尽管八股文人以及科举出身的官吏中也有许多聪明人士，但是“今尽困天下之聪明才力于场屋中，而场屋之士，又尽一生之精力，不为效命宣劳之用，徒用之于八比、小楷、试帖无足用之物。天下贸贸，莫闻大道，而其试之也，又第取之于字句点画间，其亦可谓靡靡无谓之术矣。’⑤科举所取之才，除了精通八股文，其他一切古今治国之体，朝廷礼乐之制，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利病，漠不关心，而一旦授之以官，则不知所措。更有甚者，“既不具论，即其所言，类又剿窃

①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 158 页。

②③ （清）盛康编：《经世文续编》卷六五，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盛氏思补楼刊本。

④⑤ 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 83 页，第 74～7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浮靡,聊冀幸售,使执其以问,其人将有不自解其何故而云然者,则所言之物,亦且不可复问'①。如此导致许多士子竟不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 汉祖高宗,是哪一朝皇帝'②。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也有同样的批评":故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 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③ 可见,晚清教育内容之空疏无用到了何等地步。

晚清官学教育已腐朽到极点,科举考试使懦庸阘茸之辈侥幸迭进,有奇才异能的人,由于科举所困而难以脱颖而出,致使人才贫乏。而这一切正是'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惟科举之文'④的恶果。

(二)"教官多昏耄",滥竽充数

清朝各官学的教师,规定由各省的督抚学政等政府官员负责考核。清政府对教官提出严格要求,"职在教诲,务须严立课程,用心讲解,如或怠惰致监生有戾学规者,堂上官举觉罚治"。同时还加强对教官的考核,按其文行及训士勤惰,随时荐黜。康熙年间,由直省巡抚主持教官考试,分别等第,四等以上给凭赴任,五等学习 3 年再试,六等革职。雍正初年更是严格,三等以上才能给凭赴任。清政府加强对教官的考核选拔,其目的是加强对学校的控制,使学校培养出维护封建统治正常运转的人才,但也选拔出一批学识渊博、德行高尚的教师,从而有利于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但随着清朝封建帝国的衰败,学校教育衰败不堪,教师也难以负担起培养人才的重任,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是教师的来源。以资入官体例在清朝历代都有,但入资为教官在雍正元年即行停止,其原因在于捐纳为教官者,多是不通文理的少年,以

① ④ 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 154页,第 158 页。

②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 12 册,商务印书馆,1917 年版,第 32 页。

③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年版,第 40 页。

他们为学问的优长，为年老者的师长，显然是不妥的。但嘉庆三年重又允许以资为教官，道光年间又推广捐例中准贡生捐中书，准增、附捐教职，致使教官成员复杂，不少人整天无所事事，与武夫营弁为伍，不事学习，不晓明体达用之学。不仅教官来源如此，就是学官，有的也是曾担任过其他官职由于不称职被贬的。这些人“不尽从事于学，第乐其职之闲，不厌其分之卑，阘冗无能之士，以及耄老不堪者，俱得厕乎其利”①。这些教官往往无心教授学生，致使“弟子或终岁未尝一见其师，而师未尝一教其弟子”的状况普遍存在。第二，对教官的考核流于形式。乾隆年间，以近来教职多衰老庸劣，滥竽充数，不但不能以道德礼义化导齐民，就是课士之职亦不克举，特命令各省督抚会同学政，严饬所属教官，务以实心实力劝学兴文。于是实行 3 年一次的甄别，考核教官。但是这一制度实行不久，其弊病就暴露出来，督抚和学政徇私情，互为一气，“不核其才望，不责其训课”，致使选拔出来的教官大多昏耄，徒具虚名。还有不少人“以学校为恤老怜贫之地，以司铎为投闲置散之官，甚至索贽见、勒节规，而不复问教学何义？谕训何事？”② 更有甚者，道光年间教官考试出现了雇请枪替、换卷传递、代书代作等作弊现象。连道光皇帝也不得不感叹：若不亟加整顿，何以拔真才而资师范。

对于教官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清政府不仅觉察到了，而且屡屡整顿。早在 1773 年，鉴于当时咸安宫教习疏懒怠忽，并不实心训课者居多，雍正皇帝下令整顿。道光二年（1822 年）上谕：“近日各省甄别州县，凡才具平庸年力就衰各员，率请改教。此等衰庸之

① 盛康编：《经世文续编》卷六五，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盛氏思补楼刊本。

②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60 页。

员，即令司铎，安望克称厥职？嗣后各督抚于才不胜任之知县，未经得缺,将该员品学尚堪秉铎,切实声明,酌量奏请改教。’① 事隔4年之后，道光六年(1826 年)又上谕“:近年生徒入学,不过轮期画到。查学之日，教习择其在家课读者背诵数章塞责。该教习亦止于画到，查学时始行到学。间有在学住宿者，并不教读。其宗室、觉罗及咸安宫、景山各官学，亦复如此。积习相沿，日就废弛，不可不严行饬禁。’② 24 年之后，即道光三十年(1850 年）再次上谕：“学校为教化之原,士子训课,责在教官 教官贤否,责在学政。近日教官一途，半皆年老衰庸及末学浅见之士。着各省学政严行考校。文行兼行者，方准列荐；庸劣不职者，即行甄别。至于月课岁考，尤须认真，课卷按季申送学政，诸生优劣学册，三年咨部备查。’③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多次整顿，但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糟糕。同治年间，还出现了教官干预地方公事，鱼肉士子，谄谀绅富的现象。清朝陈其元对当时教官状况讥讽道：“莫笑区区职分卑，教官也最占便宜；春秋两祭分肥胙，督抚同声叫老师；遇考可求优行代，束脩不怕上官知；有时保得京衙著，一串朝珠项下垂。’④ 真可谓辛辣之极。晚清由于重科举轻学校，对选任教官极不重视，学校教官职位低下，教官一职常是庸劣不称职人员的安置之所，因此，教育质量不高，学校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

(三)教学管理松弛

清初地方官学规定了严格的考核方法,有月课、季考,考试内容为《四书》文及策论。月课,季考的第二天,要讲《大清律例》刑名钱谷之要者若干条。月集诸生于明伦堂,诵《训饬士子文》及《卧碑》诸条，

①③《清续文献通考》卷九七，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② 《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三,光绪乙亥年(1899 年)御制本。

④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63 页。

诸生环听。除丁忧、患病、游学、有事故而请假者外，其他照定例严加考试，如有托故不到者，教官要严加惩治。3 次不到者教官严传教饬，无故而终年不应月课季考者，详列情形，给予黜革处理。生员的试卷，申送学政复查。雍正十三年（1735 年）还规定教官要详报月课、季考之文，逐一声明所讲律例何条，其听受者何人，以凭学臣查复。

清初还制订了严格的坐监制度。国子监中各种身份的监生要求坐监期限不等。“监生坐监期，恩贡六月，岁贡八月，副贡廪膳六月，增、附八月，拔贡廪膳十四月，增、附十六月，恩荫二十四月，难荫六月，例贡廪膳十四月，增、附十六月，俊秀二十四月。例监计捐监月分三十六月。”① 严格规定了生员的修业年限。这些规定有效地规范和制约着生员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学质量。

晚清，随着官学的衰败，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取消了“坐监”制度，允许监生在寓所肄业，只要在初一、十五来国子监听讲《四书》、《五经》即可，而地方官学也是衰败不堪“月课渐不举行”，学校考课也不过是徒具虚名。王榕吉在《请整顿宗学疏》中就描述了当时地方官学的情形：“初次入学，尚有教习数员、肄业生二十余人在学接晤，此后时复前往，则日形疏懈，荒置或无一人，稽察教习者难得与宗学生晤面，出题课试，交卷亦复寥寥。”② 中央官学中的觉罗学、景山学、咸安宫官学也是如此，不仅教师类乏通才，经费徒靡，而且校舍空虚，期满时，就例报成就多少名学生而已。教育管理松弛，到嘉庆二十四年（1820 年）时更为严重“各学官学生，并不常川入学肄业，该教习等亦止于查学之期，始行到学，虚开功课……陋习相沿，殊失设

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 106 卷，中华书局，1976 年版，第 3102 页。

② （清）王延熙、王树敏辑：《道咸同光奏议》卷四一，光绪壬寅（1902 年）秋上海久敬斋石印本。

学本意'[①]。可见这种颓势已经难以挽回。

清政府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整顿。例如，对南学的整顿就持续了近 20 年。道光末年，鉴于当时南学监规颓废时间较长，住学者仅百余人,清宣宗下诏整顿,其结果是难以振兴 咸丰年间,清文宗多次更改管理章程，发放经费；同治元年(1862 年）清穆宗下令兼习课论、策,用经史、性理诸书命题,奖励留心时务者,又增发每年经费 3000 两，这才使文风稍稍兴起，但情况仍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同治二年(1863 年)上谕:"满汉各学设立教习,统于国子监见充教习者传补,后并无生徒肄业,期满,仅寻数人赴监,谓之交功课,其实并无功课可交,即可得官各等语。着国子监堂官查明,认真整顿,稽核功课之勤惰,分别劝惩,毋得有名无实,敷衍了事,以昭核实。'[②] 尽管清政府认真整顿,但其管理措施散漫,管理制度松弛,尤其是晚清封建教育没落，使得学校中教学活动稀少，学校虽有设学之名却无讲学之实。正如严复在《论治学治事亦分二途》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自学校之弊既极,所谓教授训导者,每岁课两试,典名册、计贽币而已,师无所谓教,弟无所谓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③]

(四)学风、士风败坏

晚清,学校教育以科举为重心,教育内容空疏无用,教育管理松弛,使得官学设立的初衷丧失,仅被视为八旗子弟出身之阶,加上教习也不深探经义本源,尽心教诲,积习相沿,学校徒有虚名而无实效,学风、士风的败坏在所难免。

舍本逐末,是晚清学风颓败的第一个表现。为了应科举,士子们将先儒经典束之高阁,贪图近功,以求速成之效,造成埋首于时文而

① 《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三。

② 《清续文献通考》卷九六。

③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1 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88 页。

弃学问于不顾。乾隆四十四年（1789 年）曾上谕:“近时文风日坏,习制义者止图速化,而不循正轨,无论经籍束之高阁,即先儒传注,亦不暇究心,惟取浮词俗调,捋撦求售。”① 要考经却不通本经，在当时不足为怪:“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遍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 知史之正杂不能遍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 忠已偷矣。道光以后,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② 清中叶之后，坊间刻本泛滥十分严重，士子们视此为中科举的敲门砖、进身之宝,清政府虽屡下禁令,却禁而不止。乾隆时,坊间刻本合法化,使官方也加入这一行列,推波助澜。尽管后来严行禁止，但积习已深，成为不治之症。为求取功名，士子们埋头于八股,致使经书可以不读,品行可以不讲。清朝统治者曾三令五申,训饬学士要务求根本,讲究修身,但收效甚微。连清文宗也忧虑“第恐沾染时习,以文章风雅自诩,不思讲求本务,殊非崇实黜华之道”③。

揣摩剿袭，是晚清学风颓败的第二个表现。教学内容空疏无用，学子们对于空疏之学舍本逐末,但是对这“末”也是刻意揣摩剿袭,以钻营为捷径。道光中叶,时文家们揣摩的方法越来越奇特,竟有所谓“且夫”调,也就是每在提比之后或者末比之前,突然用“且夫”2 字,以振其势,却不考虑前后句子的关联。乡试、会试都用此方法,以为这是考试秘诀,而校阅的人往往入了圈套,竟然有人中榜。整个教育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师以是教,弟以是学,举子以是为揣摩,试官即以是为去取。”④ 这一风气养成士子们利禄之心,使得他们“其初既有苟得之心,其后遂为患失之计,持禄幸位,委蛇朝阙,容头过身,承顺

① ④ 《清会典事例》卷三三二。

② (清)李慈铭撰:《越缦堂读书记》,下册,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 1283 页。

③ 《清续文献通考》卷九五。

奸权,朝政猥杂,国是日非'①.

考试作弊，是学风颓败的第三个表现。晚清的科举考试，舞弊、弄虚作假、贿赂成风。舞弊的手段五花八门，“集历代之大成”。如“通关节”(买通考官)、“顶替”(冒名顶替)、“请枪”(请同考生员代做)、“联号”(买通编号人,把自己和帮手的号码编成联号)等等,还有夹带、换卷等花样。清朝学者曾描述考试送关节、送诗片的情况:“考官之于士子,先期约定符号,于试时标明卷中,谓之关节,亦曰关目。……每届科场，送关节者，纷纷皆是。或书数虚字，或也欤或也哉或也矣。于诗下加一墨圈者,银一百两,加一黄圈者,金一百两。'② 又道:“凡进士之朝殿试及京官之考试差时,预揣某官可派阅卷,则先呈字体，以便别认。既出场，即写前四句飞递朝房中所曾托情之人，谓之送诗片。'③科举舞弊之严重超过历代，就连某些名臣对科场夹带也不讳言。学子们为了中举，违规作弊，极尽钻营之能事，舞弊形式花样繁多，令人防不胜防。清朝对考试作弊的防范和处理是十分严厉的，但收效甚微。道光二年(1822 年)，针对科场出现请人写成小卷带入场的情况，清宣宗下令办理科场及搜检各官。道光六年(1826 年)顺天乡试出现了怀挟、传递及冒名顶替。清宣宗上谕：“嗣后乡、会试搜检王大臣及各直省监临等，务须破除情面，严剔弊端，认真办理，查照定例，不许夹带片纸只字，一经搜出，立予斥革，照例惩办。'④ 道光十二年(1832 年),清宣宗再次上谕:“各省士子,务各涤虑洗心，恪遵功令。点名时鱼贯而入，毋得仍前混行拥挤。如有迟误，静候补点。其不遵约束肆行喧闹者，着弹压兵拏究。已接签者，不许复出砖门;已领卷者,不准复出号舍。如有怀挟,立即惩办;误带

①盛康编：《经世文续编》卷六五。

② ③ 徐珂:《清稗类钞》,第 5册，商务印书馆,1917 年版,第 5～6页。

④ 《清续文献通考》卷八六。

者虽免治罪，仍不准其入场。其八旗士子，令弹压副都统亲身巡查，不准越号。’① 清宣宗在其后多次上谕严禁科场舞弊。粗略算一算，从道光二年(1822 年) 到道光十九年(1839 年),为严禁科场舞弊,整顿科场秩序,清宣宗在这短短的 18 年间竟‘上谕’9 次之多,可见当时考试作弊现象之严重，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清政府整顿亦于事无补。

近人王德昭对官学教育衰败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剖析“:学校既成了储才以应科举之地,又莫不受政府的统辖和管制,所以不能以其为教育机构而得遂其独立的发展。其在政府系统中的地位也不受重视。这使此机构终至丧失其生生之力，无论其所定的规制如何严密，理想如何崇高,结果乃趋于滞固而败坏。’② 可见，晚清由于重科举轻学校,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导致教学内容空疏,教官滥竽充数,教学管理混乱，学风日趋败坏。这一切表明官学教育已难以培养出维护封建国家正常运转的人才，官学已名存实亡。

二、书院积弊丛生

清初,为了防止利用书院进行反清复明活动,清政府在积极创办官学的同时,严禁创设书院,使书院的发展处于沉寂时期。雍正十一年(1773 年),清政府改变了对书院的政策,在积极创办的同时加强控制。清世宗曾颁上谕“: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摒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③ 此后书院发展迅

① 《清续文献通考》卷八六。

②王德昭著:《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 114页。

③ 《清文献通考》卷七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